

譚家明、毛尖： 對電影的感動與共鳴

何穎汶 繆丹純



譚家明

毛尖

譚家明的名字，相信最為香港人所熟悉。電影作品有：《名劍》、《愛殺》、《烈火青春》、《最後的勝利》和《殺手蝴蝶夢》等等。身為知名導演和編劇的他，現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任職助理教授。十七年前毅然息影，退隱幕後，轉戰電影剪接，最為人知的剪輯作品莫過於王家衛的《阿飛正傳》、《東邪西毒》，以及杜琪峰的《黑社會》。年前以復出作《父子》先聲奪人，橫掃多個電影提名及獎項，氣勢逼人。

毛尖女士，浙江寧波人，乃是中國知名的影評人和作家。她的著作有：《非常罪，非常美》、《當世界向右的時候》、《慢慢微笑》、《沒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等等。電影評賞寫得精彩，以茶香“毛尖”作為名字的她，氣質獨特，印象令人深刻。

導演與影評人，大家也被電影所吸引，前者負責電影的創作，後者負責評論作品的優劣，兩者的關係似有還無，似敵亦似友。有賴今屆城市文學節特別增設“文化與藝術評論”組別，這兩位志趣相投的評審委員才有機會碰面。知名導演與有名影評人首次相遇並無針鋒相對的場面。反之，二人的意見巧合地一致，一說起電影便手舞足蹈，高談闊論，互相交流和發表意見。兩位著名的電影藝術創作人難得聚首一堂，話題當然離不開“電影”。

滿足心靈的好電影

製作一部電影，花費龐大，每一格菲林也是導演的心血，能以有限的資源表達出導演的思想，相信這是每一位導演心目中的好電影。而譚家明對於好電影的要求，首要條件是要能令人感動。“一部好的電影首先要能感動人，感情要真摯，需要有vibration，要與觀眾有心靈上的交流，看後能令人有所內省，不單是停留於故事的文本層面。”的確，能觸動人心，讓人於離場後仍回味著電影的畫面，咀嚼當中的意思，這才是電影的真諦。及後他補充說：“除了在感情上有所觸動外，一部好的電影也應該能擴闊人的vision，不是只局限於所看到的，會令人有所聯想，不斷伸延出去。”

好電影的標準對閱片無數的影評人毛尖來說，很難去定下“好”的標準。“我看過不同地方的電影，早期看過不少歐洲電影如法國，也有日本和香港的電影，那個時間所看的電影較著重故事的描寫，有很好的story，那個節奏令我感到很安寧舒服。及後看蘇聯導演的電影，電影氣象又跟美國的不一樣。然後我又做中國電影研究，看了六十年代的電影，很感人的，當中包含了現代電影所缺乏的東西，又是另一種類型的電影。”不同地方和時代的電影會因應當地的文化和時勢變化而有所改變，對於這種沒有劃一標準的創作，即使是飽覽電影的毛尖也不能為“好電影”

定下標準。

雖然二人對“好電影”的看法不同，但他們都很認同vibration對電影的重要性。不需要很強烈，淡淡然的也能令電影升上另一層次。對此，譚家明以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中最後一個鏡頭作了個例子：“那一幕是食飯過後人去樓空，檯面中間放置了一個古董瓶，有些閃光在閃爍，這是蘊藏了所有感情的一幕，而也就是電影最難得的地方。”毛尖一言道出這就是電影的“重量感”，這一幕的存在，的確令《悲》頓然變得真實，變得實在。

影評人的位置

問及影評人對電影的影響力，毛尖小姐忽然激動：“一點影響力也沒有。”沒有什麼令人意外的原因，只能慨嘆於中國電影工業的公式裡並不需要影評人的存在。“現在的影評可說是走向邊緣化了，而對電影的作用也非常低，影評人地位非常低落。的確，影評是需要的，但已變得不重要了。”

而作為導演，對影評人的看法應該是又愛又恨——愛他們眼光獨到的意見，恨他們尖酸刻薄的批評。對於影評人的看法，譚家明認為：“從導演的角度，影評人也是觀眾的一種，只不過他們具備了專業訓練，熟悉電影語言，是一個能引導觀眾正確地認識電影的橋樑。”就影評人的評論角度這一點，譚家明嚴肅地說：“影評人的角度是否準確，很多時也加入了影評人對電影的個別看法。以香港為例，近年的影評水平低落，低落在於影評人的開放程度和胸襟，電影一旦不符合他們心中的預期，便會將電影給否定。影評也是創作的一種，可以主觀，但也要開放，看電影前先不要預設和要求自己想看到些什麼，而是期待電影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再從中評論，並不是當電影滿足不到他們的expectation，便對其大肆評擊。”無可否認，每個人心中也會為這世界上不同的事物設定了一個預期的標準，對於影評人，這個

預期會影響到評論的質素。而譚家明也不諱言近年來高質素的影評在香港實在愈來愈少，其原因是影評已淪為影評人突顯自己的工具。“香港不少影評也是用來突顯影評人本身的形象，突出他的價值觀，這根本是本末倒置。從創作人的角度去看，我並不是要知道影評人的品味和他的image，而是要完全開放、能inspire我的意見。”一篇好的影評，要有能力令觀眾信服。

電影的本土性

前段時間，馮小剛對於《非誠勿擾》票房不佳的言論在香港引起了軒然大波，問及二人對此有何意見，譚家明快人快語，直截了當地對馮小剛的言論提出了質疑：“我不明白為什麼作為一個導演，要這麼hard sell，這麼（對票房）耿耿於懷，大動肝火。”作為資深的導演，他對馮小剛將首映票房與影片的成功與否劃上了等號這想法不敢苟同，創作不是一種交易，不能以金錢去衡量一切。畢竟，導演的責任是把內心的思想以電影語言去表達，而不是拘泥於票房的多少。譚家明認為最重要的，反而是要知道觀眾為何會喜歡，為何會不喜歡，這才能使導演繼續進步，拍更多令觀眾認同的電影。“我覺得一部電影拍出來不是今天一天的事情，以後的觀眾一樣會接觸到這部電影。一部電影是一件細水長流的事情。”只有自己對於影片創作的過程感到滿意，才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成功。

從另一個角度看，毛尖也指出了觀眾的文化差異性。比如她所喜愛的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奠基者高達，就更加可以稱得上是“小眾”文化了。文化藝術領域的“曲高和寡”，引起了兩位藝術創作者強烈的共鳴。在眾多對馮小剛的批評聲音中，毛尖又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我還是願意支持他一下，因為他堅持為本土觀眾拍片。不像張藝謀和陳凱歌，已經不把本土觀眾放在心中了。”

維持本土性對一部電影的重要，就有如要對目標市場的觀

眾對症下藥。撇開馮小剛過於執著《非》在香港不能獲得觀眾認同的不滿，譚家明認為馮小剛堅持保留電影的本土性是對的，不如香港電影九七之後，尤其近年來“香港特色”的缺失。聽到這點，毛尖也惋惜地說：“我覺得香港電影在最輝煌的時期也很具有本土性。比如成龍的一些電影，說廣東話，拍攝地點也是很有香港特色的一些地方，可惜後期香港的一些導演太把大陸的觀眾放心中了，失掉了香港的特色。這種本土性，也正是一部電影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把本土觀眾放在心中，也就足夠了。”